

本刊专稿:文化建设研究

# 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化边界及其守护分析

孟宪平<sup>\*</sup>

〔摘 要〕 文化边界及边界意识是区分和界定不同文化形态的重要标志。文化边界一旦形成,就被赋予一定的防御力和凝聚力,也对其他形式的文化边界意识构成一种抵抗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实践,给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文化设定了自己的边界,对于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觉和价值自觉,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的文化建设中,守卫马克思主义文化阵地,要处理好促进社会发展与捍卫文化边界的关系,处理好发展科学技术与维护文化边界的关系,处理好促进文化交流与维护文化边界的关系。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文化边界;边界意识

文化边界是指文化的活动范围和存在空间,这个边界不是地理界限或疆域界限,而是因思想差别、价值差别和形式差别造成的文化格局。文化边界意识的存在和变化,是文化“元叙事”的一种规定和影响,也是为了保有自身而作出的反应。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边界的认识,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也不仅仅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叙事,而是在综合考察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思想,既是无产阶级文化叙事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 一、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文化边界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sup>①</sup>文化边界的变化也遵循这样的规律,当人的精神与旧日的生活观念决裂时,旧的文化边界就会被变更,这种变动或由社会变迁而发生,或由新思想的注入而发生,或由传统文化的退场而发生。

1. 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叙事与边界意识。如果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找边界意识的原型,最有力的论点莫过于关于“两个决裂”以及“两个绝不会”的认识,前者区别了利益界限和思想界限,后

---

<sup>\*</sup>法学博士,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资助项目、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热点难点问题研究”(13ZD001)、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资助项目以及江苏省“青蓝工程”科技创新团队项目的研究成果。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

者表达了生产关系的存在边界和生产力发展造成的边界移位。“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sup>①</sup>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明显区分了传统所有制关系与无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差别，也指出了传统观念与革命观念的差别，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打破资产阶级的利益边界和思想边界，确立自己的利益边界和思想边界。在论及资本主义命运时，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sup>②</sup>。这是说，生产力总是在一定范围内发生作用的，社会的物质存在条件也是在旧的社会中孕育和积累起来的，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具备了破茧而出的条件时，新的生产关系才能突破原来的边界。文化发展也是一个不断突破原有边界的过程，拿德国古典哲学来说，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到费尔巴哈，他们各自的理论都可以看成一种叙事形式和边界状态，但是由于思想上的衔接或观察研究中的相似性，使其文化叙事中有很多交集，其思想重叠部分往往因多次强调而固化，其中的异质内容也经常成为争论的问题或新的学科分支的源头。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以及对新世界观的概括，是突破旧的哲学叙事而建立新的话语叙事的结果。从社会主义流派的发展看，各种思想有不同的形式和边界。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理论叙事，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奠定了新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了自己的边界。江泽民在一次讲话中列举了一些思想界限：“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同私有化的界限，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议会民主的界限，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界限，学习西方先进东西同崇洋媚外的界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同消极颓废生活方式的界限，等等。”<sup>③</sup>这些“界限”有的是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初就存在的，有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而产生的。不难理解，随着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人们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变化，还会有新的思想边界。一定意义上说，边界意识是一种思想约束和行为要求，这种状况是由人的经济地位及政治地位共同影响的。马克思在论述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时对文化及文化发展的描述，表明文化有边界、行为有边界、价值也有边界，也表明人的解放与边界意识的关联性。恩格斯认为：“既然单个人不受国家的限制，那么整个国家就不会因为个人获得解放而获得解放。希腊哲学家中间有一个西徐亚人，但西徐亚人并没有因此而向希腊文化迈进一步。”<sup>④</sup>这是说，单个人跨越思想界限不等于所有人都跨越这一界限。人的解放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当人以自己为目的的活动改变世界的时候，他们也是在不断地改变边界和设定边界，“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sup>⑤</sup>。尽管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人的解放设定边界，宗教神学也为人的解放设定边界，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人的解放的现实走向。

2. 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确立新的文化理论。一是对资本及其文化矛盾的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其中包含着特殊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它以普遍主义的文化形式将充满压制性的思维强加于贫苦阶层。“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sup>⑥</sup>，资本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载体和资产阶级文化立场的支撑物。从一方面看，资本的扩张不独是物质的扩张，也是思想意识上的扩张，它在激发人的物质创造的同时也将人的创造精神推向远方。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资本的运行经常处在张力或矛盾中，人们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经常被资本所束缚。资本设定了工人和资本家各自的行为边界，也设定了各自的思想边界，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要打破这种由资产阶级主导的边界，在新思想、新文化、新社会中确立新的边界。这个过程中，“共产党一分钟也不能

①②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592、46页。

③《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1页。

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3页。

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敌对的对立”<sup>①</sup>。二是对异化劳动及其文化矛盾的分析。劳动的异化与资本的异化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事实,物质创造欲望的延伸与精神枷锁的紧缩,使劳动者经常处于思想悖论和文化矛盾之中,精神追求与物质追求形成极大的反差。“劳动所产生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所奴役。”<sup>②</sup>工人创造了现实又受到现实的奴役,“对象化竟如此表现为对象的丧失,以致个人被剥夺了最必要的对象。……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它能够占有的对象越少,而且越受自己产品即资本的统治。”<sup>③</sup>这样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文化成了提高觉悟和摆脱宗教迷误的手段,成了解决资产阶级文化矛盾的工具。三是对社会发展及其文化矛盾的分析。社会矛盾中的文化边界处于不断调适之中,由社会矛盾造成的思想迷惑经常使人处于迷雾之中。资本主义在夸张的宏大叙事背后,表达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关系,体现了特殊阶层的特殊利益,贯穿着特殊阶层的特殊意志。其中充满压制性、排他性和垄断性的话语,实质上是以普遍性为幌子表达资产阶级的立场的“意识形态”,树立了一个虚假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充满虚幻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赋予人的解放以虚无缥缈的边界,在少数人看来它是宏伟蓝图,在多数人看来它是空中楼阁,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关于全人类解放的神话,在文化表现上充满虚幻色彩,其矛盾显而易见。

3. 文化的边界意识及其现实意蕴。边界意识的合理性在于承认一种思想存在及其影响的强弱和大小,承认不同文化的相对性和差异性。形而上学思维中的边界意识,其失谬之处不在于是否承认边界意识的存在,而在于对边界意识的幻想和空洞的希望,在于坚持不愿放弃又无法完成的观念。生活中,人们力图破解对形而上学的恐怖心理,试图彻底祛除形而上学幽灵,或者用合理性的行动消解形而上学式的冲动,或者用意义的流动性和弥散性来减少形而上学式的追求,这种思维构成了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它很合理却难以完全实现。很显然,如果这种思想得以实现,就是名副其实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实际上,思想的绝对边界是不存在的,思想的无界现象也是不能想象的,处在“形而上学恐怖”和“形而上学终结”之间的边界状态,也必然遭遇很大变数。从方法论上看,文化边界意识上的“形而上学恐怖”与“形而上学终结”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相通的两点,对前者感受的加强促使人们改变其状态,其逻辑结果就是后者。因此,“‘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一切超越性价值的消失,意味着否定一切规范的合法性。”<sup>④</sup>文化的边界意识类似于“和而不同”,它不是要用一个观点来涵盖一切内容,而是承认差异、承认多样、承认个性;它不是要寻找普遍适用的游戏规则,而是承认各个领域有不同的游戏规则。边界意识承认各自必须遵循的法则以及每个领域都是人的生活空间,承认文化内涵的差别和多样,也不强求在文化上做出整齐划一的改动。就现实而言,文化交流并不否认边界意识的合理性,它不是要消除文化的多样性。“在某一个时候,文化积极地与民族或国家联系在一起,从而有了‘我们’和‘他们’的区别,而且时常是带有一定程度的排外主义。文化这时就成为身份的来源,而且火药味十足,正如我们在最近的文化和传统的‘回归’中所看到的。与那种通常多元主义与文化杂交主义的自由主义哲学所具有的容忍态度相反,这种‘回归’伴随着一种知识与道德上的强烈规范。”<sup>⑤</sup>随着文化层次的提升,思想活动边界也在变化,宗教神学的地盘和专制意识的空间,也会被改变,未来社会中充满生机而又令人期待的文化追求也会更多地成为现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66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0、91页。

④ 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⑤ [美]爱德华·W.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页。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边界形式及功能

人类意识是多样的和各有边界的,就文化的存在和发展而言,它的知识体系、语言系统、价值体系都不是单一的,它通过语言的界分、知识的界分和认识的界分等形式,表明主体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1. 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价值边界及其对“普世价值”的拒斥。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对价值边界的有无及边界意识需要客观地看待。如果抽象地谈论一般的价值问题,有些价值似乎是无边界的。但是,具体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其价值观念又是不同的,又是有边界的。社会主义人权观与资产阶级人权观截然不同,无产阶级价值观与资产阶级价值观也难以调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平等、民主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平等、民主也不完全一致。当西方文化自命为唯一普遍性的文化时,普世价值也只能是西方的价值,一些文化尤其是一些带有傲慢情绪的宗教文化,在接受其他文化价值方面普遍缺乏宽容和忍让。实际上,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寻找文化的绝对标准没有意义,因为不同文化的价值难以用统一尺度来衡量。关于这一点,考茨基认为,从形式上看,不同历史时代的某些道德要求似乎是一成不变的,如对自由平等的要求。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一下,在这种一致的表象下,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社会内容。原始基督教要求的平等,是财产追求上的平等;法国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是财产所有权的平等;社会民主党要求的自由,是合理组织劳动力、保证每个人有自由的学习、研究和娱乐时间。西方思想史上,古典自然法曾把当时人类先进思想知识化和理论化,极力使自由、平等、人权、民主、法治等观念泛化为人类的共同的准则,这是早期的“普世价值”雏形,后来的启蒙运动者也用自然法来主张它的普适性。“迄今为止,所有以超验神圣为依归,并用绝对命令的武断架势对个体行为指指戳戳的道德体系,实际上是杜撰、谎言和欺骗。”<sup>①</sup>因此,当今社会没有绝对至上的权力,也没有绝对一致的价值观。与“价值边界”相联系的“认识边界”,体现了人的认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一方面人的实践能力是有限的,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人所表现的认识成果与社会本质之间只能是一条渐近线;另一方面认识手段也是不断发展的过程,认识事物的方法和工具是不不断拓宽和发展的。认识社会问题不能脱离实践,“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的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sup>②</sup>普世价值将绝对精神外化,在自己的主张中兜圈子、打转转,忽视了多样化的价值状态,而当“绝对的批判返回到自己的出发点以后,就结束了自己的生涯。它的往后的运动是纯粹的——超越一切的群众利益的自己体内的循环,因此,群众对它已经丝毫不感兴趣了”<sup>③</sup>。普世价值观自认持有“历史规律”,却不承认“礼一分殊”,其背后包藏着西方中心主义假定,它“凭借无限的自我意识,使自己凌驾于各民族之上,期待各民族跪在自己脚下乞求指点迷津”<sup>④</sup>。“普世价值”的悖论在于:承认“君权神授”价值模式的历史性,又否认现有价值模式的历史性;承认社会价值选择的多样性,又以普世价值否定价值选择的多样性;承认文化意识的边界存在,又否认文化边界影响下的价值边界存在。

2. 马克思主义文化的话语边界意识及其话语构建要求。西方社会的形而上学传统与印欧语系的表达方式有很大关系,那些智者们最早把语言逻辑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进行考察,并揭示了语言与“逻各斯”之间的内在裂隙。普罗泰戈拉所谓“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基本意思是人可以用自己的尺度描述和衡量万物的存在与否,也间接地表达了评价标准的相对性,其中的语言逻辑自设了包含着相互矛盾的边界意识。在普罗泰戈拉的语系中,语言逻辑不

①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③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7、354页。

再是神意的表达方式和神性的寄居形式,而是充满相对性和有限性的主观产物,它经常体现为具有边界意识和分化倾向的个体性原则。20世纪以来的哲学话语中,边界意识经常体现在知识与存在层面上,维特根斯坦是用语言评判来认定“在场”与“缺场”的边界的,他在论述哲学的功能时说:“没有哲学,思想就会模糊不清;哲学应该使思想清晰,并且为思想划定明确的界限。”<sup>①</sup>这一观点触及到了表达的边界及其作用问题。当今社会上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国家的话语机会并非均等,不同国家的话语权力也不相同,它的背后有经济、政治、军事、技术等要素的支撑。国际舞台上,西方大国占据着舆论主导权,它们在国际事务中有较多的话语权,力争通过各种形式将自己的话语边界向外推延。不甘失语或无语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争取更多的话语机会来捍卫自己的思想边界,其民族性、多样性成了它们据理力争的基础。守卫民族的根以及守护共同的精神家园,是它们捍卫价值边界的活动表现,也是提升话语权和软实力的重要方式。当下的中国,提升话语影响力的重点是增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说服力,形成高度的价值自觉和文化自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调整与中国社会转型是相互促进的。我们在思想教育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整合不同的价值观,新的话语体系在新的话语环境中发生和起着作用。就国际共运史上的语言选择看,马克思恩格斯设定的原初语系、苏联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社会主义的话语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也是不一样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都表明,固守一种绝对的和一成不变的话语体系不仅是思想僵化的表现,更是革命和建设思想失语的表现。话语体系折射出时代的思维和要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当下的话语构建提供了思维前提,党和国家面临的社会环境是话语体系的场景,人民群众的创造实践是话语体系的不竭源泉。当然,必须“从底线思维、文化氛围、社会基础和话语体系等方面谋划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战略对策。”<sup>②</sup>而话语体系的构建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尤其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引领作用;要以党的领导为基础,尤其要突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要求;要坚持以人为本,尤其是突出广大群众的创造精神;要体现世界关怀,尤其是突出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

3. 马克思主义文化的交流边界及文化安全意识问题。文化边界是在文化的融合与守望中形成的。一般说来,文化交流伴随着经济交流和政治对话,伴随着技术交流和媒介的运用,它经常表现为强势文化边界向弱势文化边界的推展。遍布世界好莱坞的影视文化、到处竖起的麦当劳肯德基饮食招牌、流行于生活之中的名牌商品等,都是在经济和技术的推动下流布于世界的。而非洲的原始舞蹈、大漠中的生活观念、落后国家的民俗、爱斯基摩人的渔猎生活等,却难以渗入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希望推延自己的边界,弱势文化希望捍卫自己的边界,这使得文化的“前沿阵地”就像一个战场,尽管没有硝烟,攻与守的形势却经常发生着变化。由于文化特征的差异,经常会出现不同的情形:宽容型的文化经常采取温和的态度,体现出更多包容性;极端型的文化经常持有排拒性,不愿意接纳别类文化。世界范围内,“变动着的全球力量平衡逐渐远离西方以及更多的声音传回西方,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成了,即现代性将不被普遍化。”<sup>③</sup>在这个过程中,“与其说出现了统一的全球化,不如说全球化进程呈现出一个强劲的趋势,即全球差异阶段的出现,它不仅开启了‘文化世界橱窗’,让遥远的异域文化直接比肩而存,而且提供了一个场所,让文化的碰撞发出更嘈杂的音调。”<sup>④</sup>文化交流中的边界变更减损了文化的纯洁性内容,包括混杂化造成的文化面目改易、地域化造成的文化排异、流散化造成的文化稀释、去核心化造成的文化失魂。这些方面可以发生在意识形态碰撞中,也可以发生在日常交往中。

①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6年,第48页。

②王永贵等:《意识形态领域新变化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36页。

③④[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18页。

概念模糊是边界意识模糊的原因之一。“通常情况是,当概念呈现在文化中的时候,他们都不能够被用作文化的支撑,而是开始溶解构成自身概念的模糊碎片。”<sup>①</sup>维护自身的文化安全,首要的任务是理解自家的文化,包括:它在历史中处于什么方位,它的价值状况,它的内容或形态上的缺陷,等等。这些问题在当前的文化强国建设中,表现为对文化自觉和价值自觉的要求。生活中,人们面对着多方面的文化诱惑和价值问题,文化消费主义不仅消费娱乐和激情,也泛化了价值形态和价值模型,“纯粹的消遣”和“娱乐至死”成了普遍的表现,不少人已经失去了文化抵抗力,他们在寻求心灵慰藉的同时也放弃了心理上的防线,价值边界在无形的损耗中变得模糊了。网络文化的低技术门槛激起了网民的“创造”欲望,文化变得粗糙和粗俗,边界变得模糊和模棱,思想的慰藉与情感上的发泄之后,留下了文化安全问题。一些人心目中的国家意识衰微和普同意识加强,也降低了边界意识的防御功能,甚至一些西方文化没有遭遇任何阻滞就被全盘接受了。实际上,任何文化在交流中都不会无所戒备,文化保护才是常态,捍卫文化边界是任何一个国家经常性的措施。从整体上看,文化安全问题源于价值边界、思想边界、语言边界等被挤压变形而引起的思想恐慌和心理焦虑,也是文化自信力以及文化防御能力不足的表现。应对这种风险,最主要的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文化软实力,让群众有信心、有能力应对文化发展中的诸多挑战。

### 三、文化边界意识的影响因素及其未来走向

边界的移动是多种因素决定的,这正像“意识”的产生一样,“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存在着,他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动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权威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完全一样的关系,人就像牲畜一样威慑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sup>②</sup>这表明意识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它对应的边界也受多种因素的影响。边界的移动不是一种单向的运动,也不是单一因素的影响结果。

1. 社会发展对文化边界意识的影响。马克思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替代了。”<sup>③</sup>这不仅是经济边界的移动,也有文化边界的变化。现代经济发展中,商业对文化边界的挤压是明显的,为市场而文化的现象遍及社会之中,文化的边界意识似乎可有可无,这种现象与其说是文化的衰落不如说是精神的衰落。美国社会文化模式是一种经济形态的产物,是以经济利润为前提的,它是崇尚财富、把积累看的高于一切的文化伦理,这种重商主义文化,在人类诸多文化形态中具有特殊的价值边界。然而,这种文化边界在古代西方社会中的认可度是很小的,“在古代和中世纪,肯定会遭排斥,因为它会被认为是最卑劣的贪婪”<sup>④</sup>。中国的文化传统讲究“义”“利”平衡、安贫乐道,追求理想胜过追求财富,这种文化意识在中国古代是有市场的。但到了今天,耻于言利的观念似乎已经“落伍”,改革开放以后“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表明价值边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同样是在推进经济发展,同样是在促进社会转型,中美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边界预设却是不同的,如果只盯着美国的生活方式,以美国的社会制度、文化精神来判定我们的文化边界,那就失去了自家的价值

① [英]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韩启群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82、276页。

④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9页。



标准,而不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边界是不能随意移植和嫁接的。可见,当今世界的文化多元化影响着民族文化固有的方阵和排列顺序。发达国家希望把自己的文化逻辑强加给其他国家,而经济力量薄弱的国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文化震撼,不得不将自己原有的边界一再改写。这样的背景中,中国不仅不能淡化国家意识和边界意识,更要增强文化自信心,清醒地认识西方“世界主义”不是基于对世界文化的差异性的尊重,它试图消除文化多样性而重建一个符合自己标准的文化形态。这一命题实际上是一种普世性的帝国主义思维形式,是把自己的特殊性认识设为样板。“在文化中,它的特征是实现自我,即将个人从传统束缚和归属纽带(家庭和血缘)中解脱出来,使得他们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己;在性格结构上,是自我控制和先劳动后享受的规范,是在追求明确目标的过程中有意义的行为的规范。”<sup>①</sup>它认定“世界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和普世解放的政治计划,是自然进化的国民伦理的终点,届时经济边界、金融边界和政治边界都会消失殆尽。它对所有国家都做出一种同样口吻的虚假许诺,用“股东民主”装点乌托邦资本主义的政治神话,在民主与市场的名义下进行文化转型。面对这种“世界主义”文化的入侵,我们不能以“全人类”名义膜拜西方文化,不能自动放弃自己的文化坚守,试想:没有了文化自尊和文化自信,如何捍卫文化边界呢?因此,“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各级宣传部门领导同志要加强学习、加强实践,真正成为让人信服的行家里手。”<sup>②</sup>习近平同志在谈到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时指出:“在我国,宗教关系包括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的关系。”<sup>③</sup>这里所讲的各种关系,既是我国现实生活中的文化联系和思想联系,也指明了党和政府与宗教、社会与宗教、国内不同宗教、我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间存在的现实差异。“处理我国宗教关系,必须牢牢把握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强化党的执政基础这个根本,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坚持政府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sup>④</sup>在我国,宗教文化的存在和发展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心理根源和群众基础,但是,宗教文化必须积极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宗教不能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这方面的边界意识不能忽视。

2. 现代科学技术对文化边界意识的影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在技术边界的移动中充满文化悖论。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形态,与人的物理空间和思想空间有着密切联系。“这种无法估量的力量,一旦被自觉地运用并为广大造福,人类肩负的劳动会减少到最低限度。”<sup>⑤</sup>同样,科学技术也会造成精神边界的变化,张扬人的文化思想,释放人的创造精神,在文化素养上造就“全面的人的那种性格上的丰富和力量”。如果说人在古代社会是通过上天的意志来证明行为的合法性的,那么现代社会中,人通过精神表达、意义阐释、理性思考等方式获得文化支撑。这种情况下,文化边界和思想边界都发生变化,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sup>⑥</sup>。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功能置于生产力发挥作用的范围以内,认为科学技术不仅是重要的发明物,还是区分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信息时代,“新”与“旧”、“封闭”与“开放”、“传统”与“现代”都在剧烈交替,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都对文化边界产生巨大影响,使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更近一层,文化边界被推向更远。恩格斯在谈到中世纪的技术变化造成的观念变化时说:“传统中世纪思想方式的千年藩篱,同旧日的狭隘的故乡藩篱一样崩溃了。”<sup>⑦</sup>就文化而言,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各种社会信息和思想观念通过现代传媒手段得到迅速发展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页。

②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2014年,第106页。

③④ 习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势下的宗教工作水平》,《人民日报》2016年4月24日。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传播,导致文化边界的进一步模糊和交叉。这个时候,那些自觉推动对话的文化类型,会因为顺应潮流而处于有利的话语地位,坚守边界自然也比较容易;那些墨守陈规的文化形式,会因偏离社会主流而边缘化。技术影响下的文化边界走向哪里,是一个巨大的变数。从部落文明到古代文明的转化是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结果,农业文明是科技有了较大发展的产物,工业文明是现代科学技术影响下的全新模式,技术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技术边界的延展,使人从遮蔽状态进入无蔽状态,意识形态的笼罩性发生变化,以前的神秘物事,因注入新的解读方式而变得透明化和通俗化。技术理性支配下的意识形态,使人感到那种无形的支配力量就在身边,而当人们认真体悟和琢磨它的存在时,又感到它无边无际和难以捉摸。比如,资本主义文化边界的变化,“一个是资产阶级精于计算的精神;而另一个是现代技术和经济表达出来的永不安宁的浮士德式动机,其格言是‘无边无际的边界’,其目的是改造自然。”<sup>①</sup>由此看来,一方面是技术的每一进步给人带来的心理满足,使人在感受诗意的生活方式的同时寻找回归精神家园之路,人们将幸福托付于技术,于是就在社会的意识形态中注入了价值寄托。另一方面是技术的边界影响着价值边界,“科学技术不仅导致了人的自我疏远,而且最终导致人的自我丧失。那些看起来是为了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结果却制造出无数虚假的需要。两种冲动的互相纠缠构成了合理性这个现代观念。而两者的张力为奢华炫耀加上了道德约束,这种炫耀是征服在早期阶段的特色。”<sup>②</sup>这是科学技术对边界意识的双重影响,也是界定文化边界意识的重要思维方法。以技术的走向来说,人以诗意化态度创造性地对待自然,就会在自然中注入不断更新的人文内容,人性、物性与自然性就会在一个新的文化基础上达到和谐统一,思想的边界、价值的边界和技术的边界也将会纳入应有的、恰当的轨道。因此,圈定技术边界,守护思想底线,使技术和意识形态之间相促进,不仅是理论问题,更是现实需要。网络文化的兴起意味着文化边界意识的新变化,其精神内蕴及其新型表现方式,是现代技术影响下的价值表现方式。网络虚拟社会使网民的思维方式、认知方式及行为方式都发生很多变化,在合目的性以及合规律性的行为增加的同时,相反方向的行为也在增多。这种宽松的环境中,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技术秩序的角色要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矛盾,在不少网民看来,“文化领域是个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的地方。它是反制度的,也是反道德法律的,个人成了满足的衡量标准,他的感情、感受和判断,而不是质量与价值的一些客观标准,决定了文化对象的高下。”<sup>③</sup>技术逻辑中的网络文化,一方面使网民听命于政治规则和行政权力,另一方面提供了无边的世外桃源,以供网民骋其遐思。这种技术环境中的精神特质,既有超时空的想象力和扩展力,现代网络文化的幻觉感知模式和虚拟特征不仅有助于创建网络乌托邦,而且提供了实践和实现网络乌托邦的可能性,给予那些渴望乌托邦的人以真实的和现实的精神慰藉。这种精神特质也具有打破传统文化边界的破坏力和解构力,其中的技术与文化的关系不是谁决定谁的问题,文化获得了技术的特质,技术获得了文化的精神,网络文化成了具有现代的文化和具有现代技术特质的文化,它对边界意识经常性发生影响。

3. 社会交往对文化的边界意识的影响。世界历史总趋势中,交往的范围是由区域向全球拓展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才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式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sup>④</sup>新的生产关系中,资产阶级以分工形式界定了人际边界、行业边界、生活边界,人的行为关系就具有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特征,相应的文化发展也是一个明显的突跃,这是“以全人类相互依赖的普遍交往”而形成的新天地。社会交往是人在交往中被赋予共同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10页。

② 刘同舫:《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类解放境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39页。

③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7页。



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力量的一种表现,也是表达归属感的一种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一问题极为关注,认为这是影响共产主义思想边界的活动方式,在他们看来,通过交往,地域性的个人将为社会历史性的具有普遍经验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理论本身就不可能发展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sup>①</sup>一定意义上说,交往就是一种边界革命。世界历史上,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等都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其文化边界是以各自地域为中心在交往中向外推进的。交往是引起文化边界移动的重要原因,“原因并不复杂,一个古老的国家几乎与一个新兴的国家一样,在激烈的变革之后都失去了传统,在没有传统规范可循的时代里,一切人类天性中未经磨练的欲望便会沿着粗俗突兀的路径生长。其结果,必然是随处可见的恶俗事物。”<sup>②</sup>这种现象的实质是价值边界的畸变。在当今中国社会中,由元意识和元叙事引起的恶俗文化随处可见,刻意虚饰、矫揉造作或故意欺骗成为常见的手法,就像食品上包裹的糖衣,外面是甜的,内容却可能已经变质。恶俗报纸、恶俗广告、恶俗标识、恶俗言行、恶俗人物、恶俗信仰、恶俗建筑、恶俗影视,都是通过路的具象主义或肤浅的抽象主义方式来表达的,其意向中有过度消费的价值追求,有刻意现实创造的自我满足心理,也有故意吸引眼球的媚世心理。这样,行为主体一方面为一种生活方式作贡献,另一方面用这种生活方式将平庸和欺骗提升为一种文化理念,于是一种新的边界意识出现了,这是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和融合的结果。此外,跨文化发展所表现出的边界意识也不宜忽视,在确信社会主流或“次文化”安全的同时,必然要把其他一些文化划分到界外,文化的边缘化现象不可避免在社会中出现。这种情形提出了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决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有力批驳,针砭要害、揭露本质,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sup>③</sup>

(责任编辑:王永贵)

## Cultural Boundary and Its Protection: An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m

MENG Xian-ping

**Abstract:** Cultural boundary and boundary awareness are important symbols to distinguish and define different cultural forms. Once set up, the cultural boundary will acquire some defensive and cohesive capacity, thus offering resistance to other kinds of awareness of cultural boundaries.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actice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helps the proletarian and socialist culture define its own borders, which is of paramount importance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value consciousn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effective protection of the boundary between Marxist culture and other cultures depends heavily on whether we can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boundary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promotion of cultural exchanges.

**Key words:** Marxism; cultural boundary; boundary awareness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页。

②[美]保罗·福塞尔:《恶俗》,何纵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2年,序第1页。

③《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99页。